

《春秋》《左传》原本皆为史

杨树增*

차례

- I. 《春秋》—一部当代大事记
- II. 《左传》实史非传

【국문초록】

孔子的《春秋》는 중국 현존의 첫 번째 编年史이다. 儒家思想이 사회의 主流意识이 되었을 때, 《春秋》는 “史”에서 “经”으로 변하였다. 또한 그 초점은 자연히 “史实”에서 “经义”로 변하였다. 따라서 사람들이 经을 해석함으로써 자기의 思想意识을 신앙하게 되었으며, 이것은 今文经学의 주요한 특징이다. 《左氏春秋》는 《춘추》 이후 또 하나의 생생한 编年史인데 사람들이 이를 《춘추》의 “传”으로 보아 《左传》으로 명명하였다. 그러나 작자의 의도, 编年体例와 내용을 통해 볼 때 《좌전》은 “传”이 아니라 “史”이다. 두 책의 史적 본성을 환원하여야 이 두 가지의 중요한 典籍을 정확하게 파악하고 인식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춘추》, 史升经, 《좌전》, 非传实史

* 中国 曲阜师范大学 儒家文学研究所 教授

【中文摘要】

孔子的《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当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时，它由“史”提升为“经”，其关注点自然由“史实”转移到“经义”。于是人们借解经来引申发挥，宣扬自己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今文经学的主要特征。《左氏春秋》是继《春秋》之后又一部翔实生动的编年史，然而人们又把它视为解释《春秋》的“传”，并改称《左传》。从作者意图、编写体例及内容上看，《左传》实史非传。还原二书原本史的性质，才能对这两部重要典籍有准确的把握与认识。

关键词

《春秋》，史升经，《左传》，非传实史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其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自今上溯五千年的历史记载从未中断过。中国远在夏代就设立了史官，周灭殷后，统治集团便及时总结夏、商灭国的历史教训，把吸取夏、商丧失国家政权的沉痛教训作为新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周公旦在《召诰》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这种意识在《诗经》中也有反映：“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荡》）“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以历史为“鉴”，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防止重蹈历史上丧权亡国者的覆辙，成为后世统治阶级治国的基本思路，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官著史的基本动机。

从西周末期开始，周王室衰微，政权日益下移于各侯国，历史记载的权力不再为王室所壅断，侯国也相继出现了史官，并且在春秋末第一次出现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私人撰史的现象。孔子著《春秋》，不仅标志着他首创了儒家学派，也标志着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由此而诞生，它足以证明中国史书的基本形式——按时间顺序连续记载历史事件的编纂体例由此而形成，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但是《春秋》的体例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继它之后不久出现的《左氏春秋》（后称《左传》），才是一部史实详备、富有文采、基本成熟的编年体史著。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于是人们把孔子的《春秋》

提升为“经”，把《左传》说成是解释《春秋》的“传”。对于人们将一部编年史视为“经”，这是好理解的，因为“经”就是人们经过筛选，给那些认为是政治意义非常重要的典籍赋予的一种尊称，所以经书的标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判定的，并不在意这些典籍属于什么文体。但是把原本的“史”当作“经”，关注点自然由史实转移到经义。至于将《左氏春秋》视作“传”，就更曲解了它的性质。弄清这二部典籍原本史的性质，这不仅仅是个概念澄清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历史真实的问题，关系着对儒家这二部重要典籍准确认识与把握的问题。

I. 《春秋》——一部当代大事记

清人黄宗羲在其《谈儒木墓表》中说：“史之体有三：年经而人与事纬之者，编年也；以人经之者，列传也；以事经之者，纪事也。”他这里说的是编年体、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三种体例的区别。其实，凡是史书，都是以一定的时间顺序来展示一定的空间内人与事的变化。从这一概念出发，编年体最严格地遵循了这一定义。同时，编年体也是最早出现的史体，其它二体是后出的，是编年体基础上的发展变化。

中国先秦时期的编年史往往称作“春秋”，因为“春秋”为一年四季的简称，也就等于时间的概念。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刘知几也说：“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史通·六家》）“春秋”既指“四时”，古人以年月日的顺序来编纂史书，顺理成章地自然要以“春秋”来命名自己的著述了。

“春秋”作为一种史书体，其产生的年代是很早的，有人认为它最早产生于夏朝，如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案《汲冢琐语》记太丁事，目为《夏殷春秋》。”史料的收条保存、史书的编写，三代时还属王官的一种特权，直至西周末期，还只有周天子才能设置记史的王官——史官，

各诸侯国的历史，只能由周天子的史官来记载，称之为“四方之志”或“邦国之志”。但从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周王室逐渐衰微不振，周天子名存实亡，一些诸侯国相继称霸，有了自己的纪年，设置了自己的史官。侯国史官所记侯国史，墨子称之为“百国春秋”，《墨子·明鬼》中所引的资料就有的取之于《齐春秋》、《燕春秋》等。仅据刘节先生《中国史学史稿》统计，当时各侯国的史书就有40多种，看来墨子所称“百国春秋”不为夸大其词。在“百国春秋”中，有的称作《乘》，有的叫作《志》，有的称作《檮杌》等等，各国称呼并不统一。孟子认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孟子·离娄章句下》）刘知几在《史通·古今正史》中说：“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如楚之《书》，郑之《志》，鲁之《春秋》，魏之《纪年》，此其可得言者。”不论有多少称谓，但“春秋”几乎成了当时各诸侯国国史的通称。

年代久远的“百国春秋”大都亡佚，连孔子也没有全能见到。孔子能见到的“百国春秋”的残本，我们今天也见不到了，但我们相信孔子修《春秋》，其体例肯定有所本。尤其是他以鲁《春秋》为主本，参照其它史料，“约其辞文，去其烦重”（《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来编著自己的《春秋》，所以由孔子的《春秋》也可推测出“百国春秋”的规模。当然，孔子的《春秋》体例中，肯定也有自己独创的部分。《春秋》的记事体例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即按时间顺序把史实提纲式地排列出来，形式虽然简单，类似当今的大事记，但毕竟说明严谨的编年史体例自此产生了，开创了我国史书的基本形式。特别是打破了王官记史的垄断，使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有名有姓的史学家的著述，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向前发展。

孔子修《春秋》，大约是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返回鲁国之后，他一边致力于文化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一边编修《春秋》，直至其逝世前二年（公元前481年），才辍笔。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是

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孔子的《春秋》以16572个字写春秋242年的当代史，实在是太粗略的大事记。

被孔子本人及同时代的人称之为经的“春秋”，是指孔子之前的史籍——“百国春秋”，并不是孔子后来著的《春秋》，《庄子·外篇·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孔子生前不会想到后人会将他的《春秋》奉为“经”，就是在孔子死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也只把他的《春秋》当“史”看，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还说：“鲁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传》。”所谓“孔子史记”就指孔子的《春秋》。

孔子著史，是其晚年对史著社会意义认识的结果，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十分清楚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探究当前及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向及趋势，来寻找治理世道的规律与方法。《论语·为政》篇有这样的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为未来的发展以过去及现在为前提，未来的所因所革，一定遵循历史规律，掌握了历史规律，自然不难推知未来，所以孔子还有句话叫做“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以历史经验教训，来说明社会复杂的问题，要比理论上阐述，更言之有据，简明有力，他修撰《春秋》，就体现了这种意识。

《春秋》记事严格地遵循了编年史的体例，如《隐公十年》这样记载：

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夏，翬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记载很简略：隐公十年的春天，周历二月，隐公在中丘与齐侯、郑伯相会。这年夏天，公子翬带兵会同齐军、郑军一起攻打宋国。六月壬戌日，隐公在菅地打败宋

军……隐公与齐侯、郑伯相会于中丘，只知其事发生的年月，不知其日。公子翬带兵会同齐军、郑军一起攻打宋国，只知其事发生的季节，不知其月日。而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一事，不仅知其年月，也知其日。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是为所书之事。事件发生在“壬戌”日(第六日)，这就是所谓“以事系日”。壬戌日属“王”的“六月”，此谓“以日系月”。月之前冠以“王”字，表示周历，这一点可能与“百国春秋”不同。“六月”又属“夏”之时，“时”就是季，此谓“以月系时”。此夏季又在鲁隐公在位十年时，此谓“以时系年”。按年时月日为序来记事，既说明了此事件发生的时间，又说明了与彼事件的相互时间关系，这就是杜预所谓的“所以纪远近，别同异”的意思。《春秋》就用这样的方式，把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的242年的大事，一年又一年地全联结起来，不间断也不分离，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编年体。

孔子曾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就是遣词造句，“比事”，就是把事件按时间顺序严格加以编排。《春秋》之所以成系统，是因为它的时间观念明确，事件编排有序，所以它的脉络清晰，结构严谨，全书体例完整而统一。刘知几说：“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史通·二体》)编年体的长处就在于严格按时间顺序来排列历史事件，使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逐渐展示出来，十分便于查找，绝无重复、遗漏和混淆的现象。正因为有这样的优长处，其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事的形式才成为我国史籍的基本形式。

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另部刘知几视之为“春秋”类的史书，是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相传是战国魏国史官所作。以《竹书纪年》推测“百国春秋”，也具编年形式。所载内容，多是诸侯国大事，如侯国之间征伐、会盟、朝聘等政治活动，水、旱、虫灾、山崩地裂、日、月蚀等自然现象，祭祀、婚丧嫁娶、筑城修宫、稼穡税收等文化经济活动。《春秋》比事体例与“百国春秋”大致相仿。

《春秋》属辞的特点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功善。”(《左传·成公十四年》)，孔颖达《春秋左传序》解释说：“一曰微而显，文见于

此，而起义于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年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功善，求名而亡，欲盖而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就是说《春秋》言辞少而意义显豁，记的虽是史事却含着深刻的道理，表述婉转有章法，书尽其事，无所隐瞒歪曲，目的便是惩恶扬善。

说到《春秋》“属辞”，就需说一下孔子的“春秋笔法”，孔子修订《春秋》时，对旧史“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提炼语言，精选词句，其用语，看上去似乎平平常常，细细体味每个字都渗入作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感情，表现着作者对人物的爱憎，在简洁的语言中隐寓着褒贬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春秋笔法”。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说：“《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文笔浅显，用意深刻，以至于“一字之褒，宠逾华袞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挾。”（范宁《春秋谷梁传·序》）实际上，任何史著，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着作者的思想感情，所谓“寓情于叙事中”是也。只是《春秋》是部当代史，涉及的都是现实敏感的事，涉及的人有的还存活于世，在流露情感时不得不更需注意用语的分寸罢了。再者，《春秋》记事过于简短，类似后世的简要大事记，其中有的记事只有一、二个或数个字，仅具纲目，没有叙述史实的详情及过程，往往使人弄不清史实的因果关系，难以准确地理解它的全部含义。容易引发后世读者臆断猜测，于是主观引申发挥者有之，牵强附会者有之，曲解本意者也有之。

与《竹书纪年》一类“春秋”相比较，孔子的《春秋》最大的特点，不在于“比事”体例，也不在于“属辞”的特点，而在于有自己独特、明显的“义例”，这就是司马迁所揭示的贯通全书的原则：“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据鲁”，即以鲁国为本位来记事，又不仅限于鲁，兼记天下大势的演变，内详外略，具有列国史的意义。“亲周”，即尊周。至春秋末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纪年，早不奉周之正朔，但孔子《春

秋》仍坚持书以“王某月”，记时统一于周正，希望恢复周王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宗法一统天下。“故殷，运之三代”，即以夏商灭国周朝衰微为借鉴，拨乱反正，扶危持倾。《春秋》所记之事就是要阐明这个一贯的王道，所以记载最多的是各侯国之间政治往来、相互攻伐杀戮，其次是各国之间朝会立盟、往来聘访，此外还有各国婚丧祭祀、自然灾祥等。如果与王道相关，事虽小必记，如与王道无关，事虽大不书。春秋时期有些事件没有载入《春秋》，不一定是孔子遗漏，很可能是孔子将旧籍中的记载进行了有意的删除。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序文中又称赞《春秋》道：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繼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春秋》不追溯太遥远的历史，而是借用史的形式，对春秋当代许多重大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判断或解释，借以达到拨乱反正的政治目的，直接为现实的政治服务。《春秋》有隐晦曲折之处，但总的说来，还是以客观、求实为原则。对时代敏感或忌讳之事，敢于秉笔直书。孔子曾赞扬太史董狐书法不隐的实录精神，在他的《春秋》中，对于诸侯淫秽、纳贿、仇杀等丑行，甚至对不守君道的天子，都敢发之忿恨之亢辞。如隐公元年，鲁惠公已死，周平王向惠公妾仲子赠送助丧物，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不合礼的轻佻之举，《春秋》便记下：“秋七月，天王

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向后世君王提出“君不君则犯”的警告。《春秋》一书关系着天下国家大是大非，这势必引起当时不同人的不同强烈反映，所以孔子才感叹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

春秋末期，我国的历史进入了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型的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社会的巨变中，时代呼唤着为新社会立大法的一代精神“巨人”出现。孔子就是应运而生的精神巨人，他用一部当代史——《春秋》来完成这一历史赋予的使命。《春秋》虽然极其简略，但也与《尚书》、《周易》等文献一样成为全社会崇奉的经典。

探讨《春秋》的“微言大义”，即使刻意求深，倾心于发幽探赜，只要这种探求“经义”不脱离《春秋》“史义”，也无需挑剔。司马迁的上述高论，高度赞扬《春秋》干预社会现实的精神，就是由《春秋》所载史实本身引发出来的。但是自从把《春秋》奉为“经”，一些人，尤其是早早就立有学官且极有影响的今文学派，就开始偏离、脱离《春秋》史的性质，而主观引申“经义”，甚至借《春秋》来宣传自己的神学迷信思想。郑玄在《六艺论》中指出：“《公羊》善于讖，《谷梁》善于经。”当代有的学者也指出：“西汉时公羊家董仲舒等人用阴阳五行学说神化《春秋》，把“三纲五常”和阴阳五行相杂糅的神学思想搬到历史学中……”¹⁾与《春秋》的主旨不相副，也否定了《春秋》史的实象性质。

II. 《左传》实史非传

《春秋》原本是“史”，后来提升为“经”，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并不存在异议，分歧只在其“寓意”是由其史实本身所引出，还是脱离其“史”而臆造？而《左传》

1) 陈剩勇：《儒教伦理与中国传统史学》，《学术研究》1995年第2期。

是“史”还是“传”，却历来争论不休，这已经关系到如何认定这部典籍的基本特质的问题。我认为《左传》不是解经之“传”，而是依时记事之“史”，理由主要有三条：一是《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原本就是一部独立的编年体史著。二是《左传》原本就具备史的体例。三是《左传》所载本身就是史的内容。现较详细予以阐述：

1. 《左传》原本就是一部独立的编年体史著。

《左传》原称《左氏春秋》，名副其实地属于先秦时期“春秋”中的一种，直到司马迁著《史记》时还称其原名，并且将它与《铎氏微》、《虞氏春秋》等其它史著相提并论，认为它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并没有给《左氏春秋》冠以“传”名。（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将《左氏春秋》称之为传的，是司马迁之后的汉人，如汉宣帝时的博士严彭祖，但最有影响的则是西汉末的刘歆，刘歆为使《左氏春秋》同解释《春秋》的《公羊》、《谷梁》二传同样也立学官，便把《左氏春秋》说成是解释《春秋》经的“传”，是“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并改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刘歆曲解《左氏春秋》的性质，其动机是有政治目的的。至班固，更进一步彰明《春秋左氏传》是专注《春秋》的，并将《春秋左氏传》简称为《左氏传》，他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汉书·司马迁传赞》）“《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到西晋杜预，又把《春秋》和《左氏传》进行了合编，以《春秋》为经，以《左传》为传，每年的经文分编在对应年的传文前，完全改变了《左氏春秋》原来独立的体例，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后来虽有人认为《左传》实史非传，如《朱子语类》谓：“《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谬。”（《四库全书总目》卷29）但这类声音很微弱，人们习惯将《左氏春秋》改称为《左传》，甚至忘其初名，就是有力的证明。（本文就依习惯，也为了简便，称《左氏春秋》为《左传》）

左丘明开始撰写《左传》的时间，大致与孔子修《春秋》的时间相仿，左丘明的《左传》完成于孔子的《春秋》之后，肯定对《春秋》有所借鉴、吸收，但这也改变不了它是一部独立史著的性质。

与孔子同时开始撰写春秋史的左丘明，不会有为孔子《春秋》作传的意识。首先因为当时的左丘明并不把孔子的《春秋》视作“经”，常称孔子的《春秋》为“书”，如“《书》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显然是把《春秋》当作一部史书来看待，为一部史书来作“传”是不必要的，视孔子的《春秋》为经是独尊儒术的汉代的意识。

其次，左丘明在当时也不认为孔子的《春秋》非传才能理解。但有人说《春秋》贬损当世权势，为了避免时难，用语隐晦、用词简约，没有《左传》作“传”是难得其真意的。如东汉初的桓谭说：“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太平御览》卷610引）任何事物的性质，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得以明确，如果没有《左传》与《春秋》作比较，《春秋》何能被认为是“辞约”，又何谈“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如果说作为一个一介布衣之士的孔子，为避时难，故意用语隐晦、用词简约，而作为一个受官方控制的史官左丘明却独不避时难，要以自己的著述解释出孔子贬损当世权势的真意来，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春秋》的隐晦，主要是因为内容太多而文字太简，但语言表达还算平易浅显，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还不存在不可解读的问题，所以对于左丘明来说，不存在为之作传的必要性。对《春秋》所涉及的史实、蕴含的意义，非得“传”来解释才能解其意，那是后人的认识了。

而要证实这些论点，还需要论证历史上确有左丘明其人，以及他著史的大致时间。

历史上有无左丘明？最可靠的证明莫过于与左丘明有交往的人的证词，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孔子。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如此深切地了解左丘明的这些优秀品德，想必与左丘明有长期相处往来的经历。此语出自《论语·公冶长》，《论语》是一部由孔子

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纂集的以孔子言论为主体的著述，其现实性是可靠而无须怀疑的。

关于《左传》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比较起来可靠的还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孔安国注《论语》时说：“左丘明，鲁太史也。”这位鲁国史官很可能在后半生遇到什么不幸，双目失明，成为了一名瞽史，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左丘失明”。汉宣帝时博士严彭祖在其《严氏春秋》中曾引古本《孔子家语·观周篇》（西汉本，约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非曹魏王肃所伪作的今本《孔子家语》）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且不论其“经”、“传”之说，他至少说明孔子修《春秋》与左丘明撰《左传》，同发生在孔子返回鲁国（公元前484年）之后。

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享年73岁，旧谚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死时已是古稀老人了。而左丘明著《左传》，编年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其卒年很可能就在此年，因为次年鲁哀公去世，左丘明是鲁国史官，如果他在此年还活着，他不可能不记鲁哀公死的信息，使《左传》哀公部分成为完整的史述。左丘明比孔子去世要晚13年，估计左丘明的生年不会比孔子早。当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晚辈，基本属春秋末期人，但活到了战国初年。

晋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始说：“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此证明左丘明与孔子是师徒传承的关系。清人朱彝尊受此影响，在其《孔子弟子考》中明确把左丘明列入孔子弟子行列中。左丘明作为孔子的弟子，为了传承家法弘扬师道，为其师《春秋》作传是极有可能的，但左丘明是不是孔子的弟子呢？

若左丘明真是孔子的弟子，定是出类拔萃者，但包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内的所有孔子贤弟子的记载，都没有左丘明。孔子称呼他人，一向称其名（或字或谥或“子”）又道其姓，以示庄重，如“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晏平仲指晏婴，平仲是其字。宁武子指宁俞，“武”是其谥号，对左丘明也是称其姓名。而对自己的弟

子，则往往只呼其名而不呼其姓，以示亲昵。如他分析四个弟子的性格时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论语·先进》）称高柴为柴、曾参为参、颛孙师为师、仲由为由。即使与他人对话，他人以姓名称呼其弟子，孔子应答时也只称弟子的名，如“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论语·先进》）孔子与左丘明二人交往甚密，互相敬重，但二人从未以师生的关系称呼过。孔子的弟子称孔子为“夫子”，“夫子”即先生之意，他们不仅当面如此称呼，如曾晰问孔子：“夫子何哂由也？”（《论语·先进》）背后也如此称呼，如“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孔子的弟子从不称孔子为“仲尼”，这样直呼恩师名字是大不敬的，而《左传》中却称孔子为“仲尼”，如“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左传·哀公十一年》）左丘明对孔子的称呼显然不是其弟子的口吻，说左丘明是孔子的学生殊为无凭。

还有人认为孔子所赞许的左丘明，应是一位早于孔子的“贤者”，如唐代赵匡说：“《论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尔。”（朱彝尊《经义考》卷169）孔子之前或许有叫左丘明的人，但值得孔子一提的贤者左丘明在史籍上从未记载过，更不用说贤如史佚、迟任者？再说，被孔子称赞或引以“自比”的人，就必是“以前贤人”？孔子以“贤”赞许当时人，也不乏其例，如他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据现存文献看，除了与孔子情投意合、准备写一部与《春秋》相仿的史著的左丘明外，没有其他叫作左丘明的人值得让孔子敬佩。退一万步说，果真有一位早于孔子的“贤者”叫左丘明，他又如何会为后人孔子的《春秋》作传呢？

也有人认为左丘明是个与孔子不同时代的后人，理由是：“《左传》终于智伯之

亡，系以悼公之谥，上距孔子之卒已数十年。而所称书法不合《经》义者，亦往往有之，必非亲炙于孔子者明甚。”（崔述《洙泗考信余录》卷三）《左传》编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但最后附有鲁悼公四年（公元前463年）晋荀瑶（知伯）围攻郑国与辱骂赵孟事，其中还提到发生在公元前453年的晋韩氏、魏氏与赵氏合谋消灭知伯的事。比这些更晚的是还有鲁悼公、赵襄子之谥，这些更是孔子死了五、六十年后的事，因此一些人据此而断定《左传》不可能为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战国时期的左丘明。但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著述，几经传授，后学弟子不免有所增益有所续记。《左传》所记上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是一部有着严格编年体例的著作，没有缺少任何一年的记载，唯独鲁哀公二十七年史实记载之后，附有鲁悼公四年一则，且本则又记有悼公十三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灭知氏分晋之事，打乱了严格的编年体例，这一则显然不是原书中的文字，是后人补记的文字。姚鼐在《左传补注序》中说：“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刘昞曰：‘左氏纪年序诸侯列会，具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朱彝尊《经义考》卷169）《左传》肯定有后代传习者的增补，最后写定也在战国时期，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最初编撰与传授者左丘明。

还有人说《左传》非左丘明所作，是后人伪造，如清末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就力主《左传》为刘歆伪作，如若此，左丘明著《左传》则为虚构，刘歆伪作的《左传》属传经之作则无疑。但是刘歆是西汉末期人，而《左传》早在他之前就流传于世了，据司马迁《史记》和刘向《别录》可知：《左传》不仅有其传承体系，而且传承者依据《左传》还写有自己的著作，如铎椒依据《左传》为楚威王（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编著了《铎氏微》，虞卿采集《左传》编成《虞氏春秋》，虞卿约死于公元前235年，可见，《左传》早在战国时期就极有影响而且广泛流传于世了。其书中的内容还多被《韩

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征引或摘录，只是战国人视《左传》(时称《左氏春秋》)为“春秋”中的一种，习惯上将《左氏春秋》还称为“春秋”，所以没有引起后人的足够注意。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中写道：

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返，因入问病，以其冠纓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

《吕氏春秋·求人》篇写道：

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于今存可也。

楚公子围杀王自立事，摘录自《左传》昭公元年，宫子奇谏虞公勿借道于晋以伐虢的事，见于《左传》僖公二年和五年，伍子胥谏吴王拒绝越国求和与停止伐齐的事，见于《左传》哀公元年和十一年，孔子的《春秋》均无这方面的内容，可见《韩非子》、《吕氏春秋》所说的“春秋”，就是指《左传》，而不是指孔子的《春秋》。至于《史记》中引用了大量的《左传》的资料，那更是《左传》在刘歆之前就早已成书并在世上流传的明证，《左传》为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著无疑。

2. 《左传》原本就具备史的体例

左丘明著《左传》，借鉴、参考了“百国春秋”甚至孔子《春秋》的编年史体例，大体上以《春秋》的记事为纲，也以十二鲁君世次为序，来建构自己的框架。但《左传》在继承的基础上富有巨大的创造性，是一部有着自己特色的独立的著述。梁启超认为《左传》“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部‘组织体的’著述。彼

‘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²⁾《左传》与《春秋》，都属同类的春秋编年史性质，二者只有占有史料多少不同，写作详略不同，完成的时间不同，写作的技巧不同，历史观有所不同，在史的体例上并无二样。“深切著明”的《春秋》，当时用不着何人去解释、阐发。如果左丘明真要阐释《春秋》的真义，那么就应选择具有阐释《春秋》功能的文体，如类似《易传》的传体，至少采取“子”类中的“语体”，如《老子》、《论语》那样，才能比较便利地对《春秋》进行阐释，左丘明怎么会舍弃这些阐释性质的文体，再去编著一部与孔子《春秋》同类的春秋史？用一部史著那能专门去解释、阐发另一部史著呢？古今无有此例。正如清代崔适所言：“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如五月九日，‘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事耳，岂似‘传’体？”（《史记探源》卷一）

《左传》与《春秋》，虽都属编年体，但《春秋》不足17000字，所载春秋242年史事。《左传》180273个字，比《春秋》多十倍以上，虽也始于鲁隐公元年，下限期却多出13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还常通过人物对话，展示许多旧史遗闻，向上可追溯到夏、商、西周三代，保存了那个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显然在编写体例上与《春秋》在“大同”的基础上还有“小异”。

春秋时期鲁国比较多地保存了周代的历史文献遗存。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自然掌握了鲁国所保存的大量历史资料。杜预说左丘明“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春秋经传集解序》），左丘明为了掌握更多的史实，又同孔子一起去成周观看有关史料。孔子修成《春秋》后，左丘明又参照孔子修成的《春秋》，再逐条加以扩充敷衍，写成一部讲述春秋时期史实比《春秋》远为详备的《左传》。《左传》在孔子的《春秋》基础上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这种突破与创新不是抛弃《春秋》的编年体，而是充实、丰富了编年体的写作体例。具体表现

2)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在：内容上要比《春秋》丰富，反映的社会层面要比《春秋》广泛。《春秋》记载以鲁国为本位，《左传》仍循此例，称鲁为“我”，但叙述最多的却是晋国，其次是楚国，再次才是鲁国，其余齐、郑、宋、卫、秦等国也多有记载。可见，《春秋》主要本于《鲁春秋》，而左丘明则多参考了晋国的《乘》、楚国的《檮杌》等，博采古今各种史书记载、历史传说及逸闻琐事入史册。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或记言或记事的单一模式，吸收《尚书》记言体与《春秋》记事体的技巧，在编年体中将记事与记言有机地融合为一体，达到了叙事详明有趣，记言委婉生动。刘知几赞曰：“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

尽管《左传》记述春秋时期史事翔实，给后人理解《春秋》简略的事条以极大的启示，成了阅读《春秋》的重要参考资料，但《左传》本属先秦时期“春秋”中的一种，一直无人敢随意妄言此书是解释《春秋》的。当西汉末刘歆提出左氏传《春秋》一说时，立即遭到今文博士的激烈反对，今文博士的目的虽然是想独霸学官地位，但反对的重要理由就是坚持传统的观念——《左传》不传《春秋》。《左传》之所以在西汉长期没有立学官为官学，重要的不是学派门户之争，恰是因为它是一部独立的史著而没有传经的功能所致。从刘歆之后，持《左传》不传《春秋》观点的代有其人。如宋代刘世安认为“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可合而为一也，然后通矣。”（《元城语录》卷中语）朱熹指出：“《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朱子语类·卷八三》）清人黄震在《黄氏日钞》卷三十一中也说：“左氏虽依经作传，实则自为一书，甚至全年不及经文一字者有之。焉在其为释经哉？”

真正注解《春秋》的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因为它们的体例才是真正解经的体例。《公羊》和《谷梁》二传的书写方式是问答式，用这个方式来逐条注解《春秋》，正是后世注释的一种常用体例。另外，《公羊》和《谷梁》二传都依《春秋》的起讫时间，同样合于注释的体例。《公羊传》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主张尊王攘夷和大一统，强调拨乱反正，强化中央专制集权。《谷梁传》强调《春秋》

“大义”，重视礼义教化和宗法情亲，主张缓和各种矛盾，保障封建统治长远利益。二传虽各有阐释的重点，宣传了《春秋》思想的不同方面，但都比较切合孔子的思想。

但是对于《左传》来说，就不具备《公羊》和《谷梁》二传的体例特点了。若为解经，须依经而阐发，经、传一体，经所不书，传不能随意言他。然而在《春秋经传集解》的记事中，有经无者而传有者，也有传无者而经有者，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例如文公十八年，经文共载九件事，其中二件，即“秦伯罃卒”与“季孙行父如齐”，传中就没有。而传中记载八件事，其中二件，即齐懿公报夏阳馘父子与宋文公攻武氏事，经中又没有。又一次证明《左传》不是为解释《春秋》而著，它有着自己的编写内容及体例。

3. 《左传》所载本身就是史的内容

《春秋》与《左传》在内容上绝不仅仅只是繁简的区别，《春秋》所记涉及的多是政治、军事、灾异事件，《左传》扩大了记载范围，笔触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思想内容方面看，尽管二书都通过叙说史实体现了早期的民本思想、爱国思想等先进思想，但对许多历史事件、社会人物的政治态度还是不尽相同的。如左丘明对霸主们以武力征伐天下的霸权行为是赞同的，《左传》庄公28年至僖公32年，就以浓墨重彩来描写“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记述他以公子的身份离国出逃，最终回国夺取君位，成为一代雄主，向人们展示了一位胸无大志的平庸贵族公子历经长期磨难，终于成为眼光远大的老练政治家的历史过程，并把晋文公的成霸视为其施行礼义教化的必然结果，《僖公二十七年》写道：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在晋文公身上，体现出作者在王道思想的基础上吸纳了部分霸道的思想，把实现大一统的理想寄托在新的霸主身上，而不是寄托在衰落的周天子身上。而孔子的态度恰恰相反，在此年的经文中对晋文公如何成霸只字未提，实际上就是对晋文公成霸的一种否定。孟子说过：“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孟子·梁惠王上》），在孔孟看来，征伐之命只能出自于天子，然而五霸者，不用天子之命以征伐，恃强凌弱，占人疆域，是左右诸侯互相攻伐的罪魁，搅乱天下安定大局的祸首，故为三王事业之罪人。他们“无道桓、文之事”，指的是不赞许齐桓、晋文等称霸，并非是一点也不讲齐桓、晋文等称霸事，有时恰恰通过谴责齐桓、晋文等五霸，来宣扬王道，维护周天子的大一统。所以在《春秋》中，对王权衰落、霸权迭兴、诸侯兼并等现象大为不满，将大夫冒犯诸侯、诸侯不尊天子，视为“犯上作乱”，把大一统格局的被打破，动荡纷争局面的形成，视为“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春秋》著述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周礼、使乱臣贼子惧，从而拨乱返于正。

实际上，左丘明与孔子，可谓“殊途同归”。孔子希望抑制诸侯争霸而达到恢复旧日的统一，左丘明希望由新的霸主重新建立新的统一，大一统思想是一致的，比较而言，左丘明的大一统思想更为现实一些。因此他对春秋以来社会政治变革，所流露的思想感情与《春秋》有区别，甚至对《春秋》所谴责的人与事，有时还公开表示同情或赞扬。如鲁宣公二年，《春秋》书道：“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而《左传》则书：“晋灵公不君……乙丑，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孔子用“弑”字，左丘明用“杀”字，一字之差，表明他们二人对晋灵公的感情及对赵盾、赵穿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孔子意在谴责执政大臣不忠，讨伐“臣弑君”的罪行，而左丘明则旨在暴露为君不仁，同情下属对暴君的反抗。左丘明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明知与孔子的观点不同，也毫不顾及，也不加说明，这本身就不是在作传。

《左传》不仅广泛采录了各国历史文献，还采撷了各种历史传说、民谣谚语，而且还不排斥神鬼迷信、奇闻怪事，与《春秋》对待史料的谨慎态度有很大不同。

如《左传·庄公八年》：“冬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齐侯在野外打猎时看到一头大野猪，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野猪竟像人一样站立而啼哭。不久，齐侯就得到报应，被叛乱的人所杀。在《左传》的历史事件记述中，常穿插着许多迷信的祸福预言，而且这些预言在后来又往往应验。如《昭公三十一年》：“赵简子梦童子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赵简子夜里梦见一个小孩裸身歌舞，白天又发生了日食，让史墨占梦，史墨解释说：六年此月的庚辰日，吴国会攻入楚国的郢都，但最终还是不能取胜。而六年后（定公四年）吴军攻入郢的史实证实了史墨的解梦所言。如果《左传》是为《春秋》作传，就不能广采神鬼怪异故事，因为这些“虚枉”的记载与《春秋》的记述与宗旨极为不合，不仅无助于释经，而且与孔子的“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格格不入。（《论语·述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范宁《春秋谷梁集解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艳而富”，是指《左传》文字优美内容富赡，“失之诬”，是指《左传》严重歪曲了《春秋》本义。确实，《左传》中大讲“怪、力、乱、神”，大赞诸侯称王称霸，这是与《春秋》的本义背道而驰的，所以刘逢禄说：“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箴膏肓评》）但《汉书·艺文志》载：“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如果左丘明是为《春秋》作传，那就要传述其本意，何可表达与本意相违背的“诬”？如果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那么就应坚守《春秋》的真义，“艳而富”大可不必，而“失之诬”更万万不可，左丘明已带头“失其真”，又何“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左传》不仅在内容上远远比《春秋》丰富，而且创造了多种叙事方法，如顺叙、倒叙、类叙、次叙、断续叙、牵连叙等，一改《春秋》只简单地使用顺叙、流水帐式的简单记史方法，艺术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样，《左传》实际上就在

一定范围突破了编年体的界限，对事件与人物有相对的整体把握，有时能给予集中的描述，使事件的记叙有了纪事本末体的因素，使人物的刻画有了纪传体的意味。作者善于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历史事件的始末过程，能把材料组织得井然有序，把看似平淡的事件，描写出引人入胜的情节来，用生动的故事代替简单枯燥的事件概述，这在叙述春秋时期五大战役上尤为表现得突出。作者善于将人物置于复杂曲折的历史事件中，来描述各具神态的人物行为，描摹口吻毕肖的人物话语，甚至加进了自己的想象与虚构，把似乎无奇的人物、情节、细节也写得富有传奇色彩。《左传》有系统、有组织、生动形象的编纂方法，标志着中国成系统的儒家历史散文的成熟，它开创了中国编年体写作的新纪元。梁启超认为：“故左丘可谓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也，又秦汉以降史界不祧之大宗也。”³⁾ 梁启超对左丘明的评价，确实很有识才的眼光。

【参考文献】

- 简宗梧，周何.《左传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总义论著目录》[M].台北：洪叶文化事业公司，2000.
- 左丘明.《春秋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3.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 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杨树增.《中国历史文学》[M].北京：远方出版社，2003.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Abstract

The Historicity of Zuozhuan(左傳) and Chunqiu(春秋)

Yang, Shu-Zeng

Confucius's *Chunqiu* is China's first extant chronicle, when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mainstream consciousness, it is also by the "history" to the "Classic", the focus naturally from the "facts" to "Sutra". The main features so people borrow extended exegesis to play, to promote their ideology, which is Jinwen. *Zuozhuan* is following the *Chunqiu* and a lively and informative chronicle, but people took it as an interpretive *Chunqiu* and "zhuan" and renamed *Zuozhuan*. From the author's intention, writing style and content point of view, *Zuozhuan* non traditional real history. Restore the original history of the nature of two books to these two important books have an accurate grasp and understanding.

Key Word

Chunqiu(春秋), Zuozhuan(左傳), History, Classic, Traditional

▪ 논문투고일 : 2013.12.7. 심사완료일 : 2014.2.14. 게재결정일 : 2014.2.14.